

中法对照《九章算术》出版背后

■郭书春

【我认为，除少数欧洲中心论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外,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看不到或看不懂中国古代数学著作而接受了错误的信息。】

4 月 14 日至 15 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举办,中国科学院推荐的“中法对照《九章算术》”入展改革开放 40 周年引才引智成果展览,取得良好的效果。得知这些,真是百感交集。

中法对照《九章算术》(Les NeufChapitres—le Classsiques Mathé-matiques de la Chines ancienne et sesCommentaires)是我 and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林力娜(K.Chemla)历时 20 余年在中法科学合作协议框架内合作完成的,于 2004 年在巴黎出版,深受西方学术界欢迎,不到一年便脱销。2005 年 7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该书的新闻发布会。2006 年 6 月该书获法兰西学院学士院奖(平山郁夫奖)。K.Chemla 获法国骑士勋章,这部书是其重要成果之一,她现在是在国际学术界非常活跃的著名中国数学史家。

回想 1981 年春,改革开放不久,科学的春风刚吹开中外科学交流的大门,中国科学院教育局来函,说一位法国大学毕业生要求来研究所学习中国数学史。这位法国学生便是 K.Chemla,她 1980 年毕业于法国女子高师数学系,获优秀毕业生奖励。在当年我驻法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她通过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的交谈,产生了来我所学习中国数学史的想法。但当时中国科学学不能接收外国留学生,院教育局便与高教部联系,学籍归高教部,食宿由他们安排在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留学生楼,教学任务由我所承担,教学地点在邮电学院留学生楼 Chemla 的宿舍。

当年的 4 月 9 日 Chemla 到北京时只在从巴黎到北京两个礼拜的火车上跟别人学过几句中国话,一个中国字都不会写,却要在 8 个月内学习元朝李

冶的数学著作《测圆海镜》,以便回国拿博士学位。由于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所当时归属单位)从五七干校撤回北京后偷偷学了点法语,领导决定由我担任主要教师,我只好停止了英语中级班的学习,教她中文和中国数学史。在她精通中文并有了一些中国数学史知识之后,梅荣照便教她《测圆海镜》,著名中国数学史家严敦杰、杜石然等也都给她讲过课。

开始,Chemla 的中文几乎是空白,我也只是会几个法语单词,口语不行,英语更不行,怎么教她,实在犯难。当时我对刘徽《九章算术注》的研究已有突破,考虑再三,我决定以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的部分章节及我对刘徽《九章算术注》的研究成果为教材,这样,在她学习中文的同时,也学习了中国数学史知识。上课时法文、中文、英文甚至肢体语言一起用。Chemla 真是绝顶聪明,半年之后,她便能说中国话,并借助字典,看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了,对《测圆海镜》的认识也开始有创见。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数学有许多偏见,这些偏见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界。我认为,除少数欧洲中心论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外,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看不到或看不懂中国古代数学著作而接受了错误的信息。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古代数学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认识《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因此 11 月份在 Chemla 回国前夕,我向她建议:如果她回国拿到博士学位并能到国家科研工作,我们就合作将《九章算术》(含刘徽注、李淳风等注释)译成法文,她欣然同意。

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经过协商,1983 年批准在中法科学合作协议的框架内合作完成《九章算术》的研究与翻译。从 1984 年 6 月至 1993 年 12 月,Chemla 三次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两次去巴黎,共同翻译,互相磋切,不断修改,几易其稿。其工作模式大体是:我确定《九章算术》底本的文字,向 Chemla 讲解《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意思,对错误文字提出校勘意见。然后进行讨论、质疑。同时,边讨论边翻译。Chemla 常常提出一些我想不到的真知灼见,这大约是不同的文化传统交融的成果

吧! Chemla 根据我们讨论的结果整理出法文稿,我再看是否准确表达了《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意思,书面提出修改意见。两人再讨论,直至得到双方满意的文稿。全文初稿完成之后,又几次边讨论边修改。再由 Chemla 对法文润色加工,最后定稿,全书 1100 余页,著名科学史家 G. Lloyd(罗界)勋爵写了序言。

我们的工作非常艰难,因为翻译与写论文不同。写论文,对不懂的话,你可以不理。但做翻译,则对每一句话,每个字,都得弄明白,否则无法下笔。在 2005 年的出版发布会上,我说了一句:“早知这么难,就不会干了!”引起全场哄堂大笑,这确实是我内心的写照。

Chemla 非常敬业。讲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当时我们研究所在东总布胡同 19 号,条件相当恶劣简陋。我外地一个朋友来,在院子里端详了好久,问我一句话:“这是科学院吗?”使我哭笑不得。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几次工作,每次工作几个月。更令今天的青年人想不到的是,我们院子里没有厕所,要方便的话得到距研究所一二百米的街道厕所,又脏又臭。那时我只是感到不方便,因为从小到大,厕所臭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待我 1985 年到巴黎工作,看到人家的厕所那么干净,根本没有异味,才回到一位二十几岁优雅的女巴黎小姐在北京要连续几个月甚至半年间忍受那熏天臭气,是多么了不起!没有对数学史事业的热爱,是绝对做不到的。

中法对照《九章算术》的成功表明,中国专家和以某种外语为母语的外国专家通力合作是将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译成外文的最准确、快速的途径,为后续同类工作开展提供了工作范式。正是根据这种理念,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支持下,我们于 2016 年又成功地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学典籍《九章算术》及《算经十书》研究与英译”(2017—2021),主要合作者是国际数学史学会前主席、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Joseph W Dauben(周道本)教授和几位中国数学史的知名学者。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未走之路

■罗伯特·弗罗斯特

金色的树林中有两条岔路，
可惜我不能沿着两条路行走；
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
极目眺望其中一条路的尽头，
直到它转弯，消失在树林深处。

然后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条路，
这条路也许更值得我向往，
因为它荒草丛生，人迹罕至；
不过说到其冷清与诡异，
两条路几乎一模一样。

那天早晨两条路都铺满落叶，
落叶上都没有被踩踏的痕迹。
唉，我把第一条路留给将来！
但我知道人世间阡陌纵横，
我不知将来能否再回到那里。

我将会一边叹息一边叙述，
在某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后：
曾有两条小路在树林中分手，
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
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摘自《未走之路：弗罗斯特诗选》,[美]弗罗斯特著,曹明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 3 月出版)



飞沿走笔

选择何种疗法,既关技术又涉文化

■张田勘

【癌症病人使用替代疗法后常常拒绝使用被证实有效的标准疗法,由此提高了死亡风险。】

医生和病人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治癌和治病事关生死,取决于技术和文化。《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期刊(JAMA Oncology)刚刚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就体现了癌症防治的技术和文化。

关于癌症,世界卫生组织有三个三分之一经典表述:癌症的三分之一是可以预防的,三分之一癌症患者早发现早治疗是可以治愈的,无希望治愈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可以姑息治疗减轻症状的。

在癌症治疗或治愈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三种现象存在。

第一种是在治癌过程中受到欺骗可能延误治疗而难以治愈的癌症患者,近日被揭穿的一名叫邱瀚民的“女大师”,声称看一眼就能治愈癌症和催眠,因为其身上有宇宙能量,就让一些癌症患者受骗。第二种情况是受到并没有经过循证医学检验的治疗方法的误导,也会延误治疗,刚刚在《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标准(正规)癌症疗法(手术、化疗和放疗)之外,倘若患者还使用替代疗法,反而可能会增加患者的死亡风险!第三种情况是,经过循证医学证明的标准癌症治疗后,癌症得到治愈,例如,世界各国的统计表明,早期前列腺癌的五生存率接近 100%。

癌症治疗的这三种现象不会出现等量齐观的三分之一,很可能是一种橄榄型,其中,不按正规方案治疗而难以治愈的癌症患者人数会越来越多。

美国耶鲁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美国国家癌症

数据库中的近 200 万名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这些患者患各种常见的癌症,如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等。其中有 258 名患者在标准的癌症疗法之外,还使用了替代疗法。

研究人员再从癌症患者中找到与这 258 名患者在年龄、癌症类型、性别、种族、收入、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相匹配的 1000 多人作为对照组,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接受过替代疗法的患者,5 年生存率有显著下降,其中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的预后最差,既接受标准疗法又接受替代疗法的患者只有 70%可生存 5 年,但只接受正规疗法的患者有 85%可生存 5 年。

进一步分析发现,那些使用了替代疗法的患者,虽然也曾接受过常规抗癌疗法的治疗,但他们更有可能拒绝医生提出的其他标准治疗建议。例如,有 7%的患者拒绝接受手术(对照组为 0.1%),34.1%的患者拒绝接受化疗(对照组为 3.2%),53%的患者拒绝放疗(对照组为 2.3%),33.7%的患者拒绝激素疗法(对照组为 2.8%)。

由此,研究人员认为,两组癌症病人在治愈和生存率上的差异主要来自患者对进一步进行常规(标准)治疗的拒绝。这提示,癌症病人使用替代疗法后常常拒绝使用被证实有效的标准疗法,由此提高了死亡风险。

现实中一些癌症个案对这项研究结果作了旁证。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于 2003 年 10 月在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胰腺肿瘤,活检结果表明并不是恶性度极高的胰腺癌(也称胰导管癌),而是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但乔布斯不愿接受正规的肿瘤切除手术,而是选择素食、针刺疗法和草药等替代疗法。

9 个月后,乔布斯的肿瘤发生转移,此时他才不得已接受手术,但为时已晚。2009 年 1 月,乔布斯因胰腺癌转移而接受肝脏移植手术,2011 年 10 月 5 日因癌症恶化身亡。中国的女歌手姚贝娜,演唱陈晓旭、徐婷,女博士于娟等也是在患癌后曾一度拒绝正规疗法,采用五花八门的替代疗法,最后不治而亡。

替代疗法又称补充疗法,是指现代医疗(手术和放疗等标准疗法)之外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药、理疗、针灸、按摩、瑜伽以及冥想等。相对于现代医学的治疗方式,替代疗法并没有经过循证医学的检验,因此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替代疗法的市场很大,相信的人也很多,尤其是中国人较为相信。全世界有 48%~88%的癌症患者会在正规治疗之外,额外使用替代疗法。而且,不少人相信,这类疗法就算没有疗效,也没有坏处。如果能给患者带来心理上的慰藉,或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是有益的。

但是,现在耶鲁大学的研究证明,由于采用替代疗法而耽误正规治疗会明显降低癌症的治愈率。癌症的治愈是指临床治愈,患者罹患某种癌症并接受治疗之后,体内检测不到癌细胞,癌症也没有再复发,而且患者没有因为这种癌症而死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癌细胞卷土重来的时间都在 5 年以内,所以临床上常用“五年生存率”来衡量某种癌症的治愈概率。

与耶鲁大学研究人员相似的研究结果也屡屡证明,患癌后接受标准正规的治疗会大大提高治愈率,因此也能减少由于替代疗法而延误标准疗法所导致的癌症患者的不治而亡。如此,可以打破世界卫生组织的三分之二判断,即让可治愈的癌症病人大大超过三分之一,或达到三分之二,直到未来可以完全预防和治愈癌症。

游走东邻

拉面

■刘凌子

【后来发现拉面在国内虽然被当作一种主食,但在日本算是“菜”类,经常有拉面店会设置一些“拉面配米饭”的套餐。】

记得第一次来日本,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叫作“舌尖上的北海道”的团队游,一个人跟团来品尝日本美食。第一站就是“拉面村”。

在车上听导游介绍,日本有三大拉面:北海道的札幌拉面、九州的博客多拉面和喜多方拉面。这次来的北海道酱油拉面、盐味(鸡汤)拉面和味噌拉面都很有名,建议大家去拉面村尝尝。我听了这话就十分不解:我们国内拉面都是“牛肉拉面”“排骨拉面”等等,以“主料”命名,为什么日本的拉面要用调料命名?到了餐厅才知道,拉面只有一两种,除此之外想加肉还是蛋都要单点。我点了一份盐味拉面,鸡汤味没怎么尝出来,但确实是咸得可以,面上摆有一片叉烧肉、一点葱末和一些笋干,对于第一次吃日本拉面的我来说实在觉得算不上好吃。后来发现拉面在国内虽然被当作一种主食,但在日本算是“菜”类,经常有拉面店会设置一些“拉面配米饭”的套餐,让刚到日本的中国人一头雾水。拥有同样待遇的还有饺子,在日本也被当作一种小菜。

就像我觉得日本的拉面不怎么样好吃一样,日本人也觉得我们国内的“日式拉面”味道一般,可以说我们在国内吃到的某些著名“日式拉面”品牌,是适应了国人的口味进行的改良,一些国内家喻户晓的牌子日本人甚至没听说过。我来日本之前最喜欢的“日式猪软骨拉面”,来到日本更是一次都没有见过。九州盛产的豚骨拉面,用猪骨熬制成乳白色的汤头,与我们在国内吃的大部分“日本拉面”有几分相近之处:毕竟味干拉面来自九州,我们国内的“日本拉面”大概都起源于日本九州的“豚骨拉面”吧。

上的纪念碑作用,更有着特殊的城市文化意义。“埃菲尔铁塔”的胜利,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建筑思想上的胜利,是建筑告别“砖石时代”走向“钢结构”的人类进步之里程碑,它彰显了 20 世纪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重要思想。

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但它们对建筑的保护与传承有特别的“地标特色”。对建筑地标的保护与传承,纽约走在美国诸城市的前列,如 1965 年便出台了《城市地标法》。

如 1981 年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宣布纽约帝国大厦(1931 年)为地标建筑,是因为它是一幢在世界建筑史上创造新高度的现代摩天楼(直至 1971 年世贸中心建成才首次超越它),其标志性不仅代表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最新建造技术,还因其建筑立面夺目为纽约天际线创造了艺术境界。1986 年又被美国内政部属下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定为历史地标,2007 年在美国建筑师学会评选的“美国人最喜欢的建筑”中排名第一。可见,标志性建筑是城市生活,也是城市记忆,恰如人类文化学家艾文·克皮托夫所言,“地标是潜在的‘说书人’,它承载着传说与故事,在阐明地域的时代演进中,见证了地标建筑的技术与艺术发展。”

城市地标建筑不仅是城市文化内涵的符号,还能促进城市文化旅游,成为城市文化振兴不可缺失的“硬件”。这方面绝好的例子是 1997 年对外开放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它被业界称为传递着充满创造力的外观且有世界上最壮观的解构主义风格,《纽约客》的艺术评论家们将它描述为一个斗篷起伏状的神奇梦想之帆。对城市的贡献是标志性建筑的文化艺术魅力,它在减缓城市衰败时,为城市发展乃至整片区域创收。仅 1997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2 月就有超过 700 万游客参观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且每年增加游客量接近 10%。

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标志性建筑,它们不仅反映建造者的文化诉求,更遵循时代的考量,更会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我们必须为了城市美好与繁荣,要在厚植大量的城市“底色”建筑根脉基础上,发展经过优化的且特色鲜明的标志性建筑。

既然在国外这样广为流传,那么作为日本特色的拉面一定跟中国拉面起源不同吧?毕竟看起来也确实和我们国内拉面长相不同。然而问了一些日本人,大家纷纷表示:“拉面”就是“中华面”啊,从你们中国传入日本,乌冬和荞麦才是我们日本人古代传下来的面食。那么为什么日本的拉面看起来跟中国的大不一样呢?网上查了才知道,日本的拉面大多并非“手拉面”,而是机器“压”出来的,至于叫拉面完全是中文的音译。之所以说是中华面,是因为中国制面时会加入碱水,所以加入碱水成为在日本区分拉面和其他面的特征。的确日本拉面以黄色居多,据说就是因为加入了碱水增加了面的弹性和风味。而这样的制面技法传到日本也并不久远,最早要追溯到江户末期明治期间来日本的中国人,他们从中国带来了制面技法,给日本官员献上或开业进行售卖,让“中国”拉面在日本传开。想来当初拉面在日本被称为“南京拉面”,现在拉面却在国内大火,被称为“日本拉面”。

其实日本也有用手拉的“拉面”,被称为“手打拉面”,可以算上“中国特色拉面”了。像最近东京神保町新开的“兰州手打拉面”,就打着“手打拉面”的牌子。据说身为日本人的店主偶然在中国吃了拉面,瞬间被其美味征服,放弃高薪工作来到正宗的兰州拉面大师门下拜师学艺。尽管一开始他多次被拒之门外,但最后他终于用诚心打动大师,苦练技艺,最终学成归来。这与其说卖的是面,不如说卖的是故事,从开店当天起,店门就排起长队,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几个月,可谓是一个难求。在我这样一个“不专业吃货”尝起来,与我在北京吃的兰州牛肉拉面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可能吃惯了“日式拉面”的日本人来说,仅仅是面的形态就分为“平面”“细面”“三角面”的兰州手打拉面可能是让味蕾觉醒的新美食了。推崇“匠人精神”的日本人看到一碗“三鞭萝卜”“多年苦学”而来的拉面,怕是还没入口就要热泪盈眶了吧。

美好城市离不开标志性建筑

■金磊